

【史学笔谈】

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学科发展

编者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当代社会全方位的转型,中国史研究如何继承优良的史学传统,更新理论与方法,把握学科发展的特点和态势,成为摆在学界同仁面前的时代命题。本刊有幸邀请到瞿林东、陈支平、范金民、常建华、李华瑞、徐彬六位学者就此展开笔谈。宋代史家吴缜作史三原则说有何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如何认识和超越历史与文化的歧义?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什么?怎样进行历史计量研究?宋史文献特点有哪些?家谱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何在?学者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对以上问题给予了思考和回答。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1-0001-14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Editor's Not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full-scal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how to inherit excellent tradition of historiography, update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have become a proposition of the era for the academia. Our journal has the honor to invite the following six scholars for a discussion on this by writing, such as Qu Donglin, Chen Zhiping, Fan Jinmin, Chang Jianhua, Li Huarui, Xu Bin. What is the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Wu Zhen, a historian in the Song Dynasty? How can we understand and transcend the ambiguity of history and culture? What is the latest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research of social history? How can we implement quantitative study of history? What is the literature of the Song history? What are the significance and methods of genealogy research? The scholars give their answers and speculations on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ir studies.

事实·褒贬·文采:吴缜作史三原则说的理论意义*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人们研究历史,至少要包含认识历史和历史撰述两个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和升华,即由思想转变成著作(时下常称作文本)的过程。

中国史家对于历史撰述,历来有很高的要求。孔子是我们现在已知的开创私人撰史的第一人,《左传》作者称赞《春秋》说:“微而显,志

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左传·成公十四年》)又,《穀梁传·桓公五年》称:“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司马迁进而指出:“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

以上这些说法,都是从历史撰述的角度和要求对《春秋》的评论。至于孔子本人对待认识历史、解释历史是持怎样的态度呢?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

*收稿日期:2013-12-05

作者简介:瞿林东(1937-),男,安徽肥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

引用格式:瞿林东.事实·褒贬·文采:吴缜作史三原则说的理论意义[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001-003.

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表明，孔子在解释历史时十分重视以“文献”为根据。孔子又强调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表明，孔子十分注重文辞的修养。至于孔子同史学的关系，孟子有一段很重要的谈话，这就是：“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杻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这段话的内涵非常丰富，反映了史学兴起的社会条件，史书撰写的内容，史书文字表述的要求，以及史书所包含的对于历史的价值判断即善恶褒贬之大义。从孟子的这段谈话中，又表明孔子格外看重史书中的“义”。

以上孔子自身的言论和思想与上引《左传》《穀梁传》司马迁对孔子及其《春秋》的评价，大致是吻合的。综合起来看，这些言论和思想，已包含了中国古代史家所提出的历史撰述三原则，即事实、褒贬、文采及其逻辑联系。当然，在史学发展的漫长的岁月里，不同的史家从某一具体条件出发，会强调其中某一个原则的重要，或批评对于某一原则的背离，以至于刘勰提出了“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文心雕龙·史传》）的名言，刘知几提出了“史才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的著名论断等等，都是历史撰述三原则说得以提出的思想前提。

二

北宋史学批评家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一书，对欧阳修、宋祁所撰《新唐书》提出批评，并撰写了长篇序文。这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件。

《新唐书纠谬》的正文分为20个门类，“纠”《新唐书》之“谬”，这20个门类是：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自相违舛，年月时世交互，官爵姓名谬误，世系乡里无法，尊敬君亲不严，纪志表传不相符合，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载述脱误，事状丛复，宜削而反存，当书而反阙，义例不明，先后失序，编次未当，与夺不常，事有可疑，字书非是。而其序文则明确地提出了历史撰述的三原则说，吴缜写道：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序}

这段话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全面地和明确地把握了历史撰述的几个重要原则及其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此之前，关于历史撰述，除上文所列举的某些言论和思想外，还有讨论正闰问题者，有讨论起元问题者，尤其是刘知几著《史通》，提出了有关历史撰述的体裁、体例、直书、曲笔、采撰、叙事等问题。这都是历史撰述中的重要问题，但像吴缜这样全面地、高度概括地把历史撰述中的几个重要原则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尚属首次。

第二，吴缜不仅提出了历史撰述的三原则，而且对其内涵作了扼要的解释，认为：所谓“事实”，就是“有是事而如是书”；所谓“褒贬”，就是“寓惩劝”于事实的叙述之中；所谓“文采”，就是借助“文采”而使所得之事实、所寓之惩劝得以向社会传播。吴缜对三原则的解释，字少而意深，具有理论上的启发。

第三，吴缜对于历史撰述三原则各自的位置，并不是作同等的看待。他认为，“事实”是三原则的基础，处于核心位置，它既是“褒贬”的依据，也是“文采”得以展现的依托。惟其如此，作史之人掌握了事实，即使缺乏褒贬与文采，也还可以被视为具有“为史之意”者；反之，只是一味在褒贬、文采上作文章，枉顾了事实，则是失“为史之意”者。

要之，吴缜提出了一个整体的而且是有重点的历史撰述三原则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上是一个新的成就，就是对当今的史学理论建设也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认识历史和历史撰述，并不仅仅是为了把握事实和“还原”历史真相，对于完整意义的认识历史和历史撰述来说，价值判断方面的见识和文字表述方面的修养，同样是重要的；反之，缺乏以事实为根据的所谓

“褒贬”即价值判断,以及用玩弄词藻取悦公众的种种做法,本质上已与史学背道而驰。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可取的。这是吴缜的历史撰述三原则说对于当今史学发展的重要启示。

三

然而,对于吴缜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这一突出贡献,后人的看法亦颇有歧义。大致说来,重考据者言其非,重理论者论其是,这在钱大昕与章学诚对吴缜的评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钱大昕为乾嘉时期考史名家,他在为《新唐书纠谬》所作的一篇跋文写道:“吴廷珍(按指吴缜——引者)初登第,上书欧阳公,求预史局。公以其轻佻,不许。及新史(按指《新唐书》——引者)成,作此书,诋毁不遗余力。然廷珍读书既少,用功亦浅,其所指摘,多不中要害。”钱文继而乃举若干实例以证吴缜之误后写道:“新史舛谬固多,廷珍所纠,非无可采,但其沾沾自喜,只欲快其胸臆,则非忠厚长者之道。欧公以轻佻屏之,宜矣。”^[1]这里所批评的,一是说其学力浅,二是说其所“纠”不中“要害”,三是说其“沾沾自喜,只欲快其胸臆”的治学态度。当然,钱大昕还是指出《新唐书》“舛谬固多”,吴缜所纠“非无可采”的事实,但他否定吴缜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同是乾嘉时期史学名家的章学诚却持相反的态度,他认为:从《新唐书纠谬》所列20个门类进行“纠谬”来看,“观其贯串全书,用心精密,诚有功於研唐事者,前人比之于箴膏肓,起废疾,殆将过之无不及也。”他还批评晁公武对吴缜的指摘,写道:

晁公武曰:“缜不能属文,多误有诋诃。如

《张九龄传》云:‘武惠妃陷太子瑛事,九龄奏之,故卒九龄相而太子得不废。’缜以谓时九龄已相,而太子竟以废死,以为新书似实而虚。按史文谓终九龄在相位日,太子得不废也。岂谓卒以九龄为相,太子终无患乎?”是说良允。然二十篇书,隶四百余事,偶因一事失检,而遂谓多有误诋,毋乃刻欤!观其自序与进书之表,颇识文章体要,史氏鸿裁;而竟因一言之失,谓其不能属文,何恶之甚邪!^[2]⁴²⁵

这里说的“颇识文章体要,史氏鸿裁”,就超出了以一言一事论是非的藩篱,而是指思想和器识了。章学诚认为欧阳修拒绝吴缜参与修史的请求,是缺乏“大匠度材”的眼光,同时指出当时的现实社会应当重视“后生”的发展。从章学诚的这些评论来看,他肯定吴缜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

与钱、章二人的评论相比较,章学诚的见解似看得更开阔一些,一是从主流上看“纠谬”的得失,二是从全局的见识上看作者思想的高度。当然,钱、章均为史学大家,术有专攻,皆以独断之学名于时,并对后世有极大影响,我们似不必以这一具体问题,论其高下,评其是非。我们的目的,是要从吴缜的作史三原则说的内涵中,得到现实的启示,在求真精神、判断标准、表述规范及其统一的基础上反思和前瞻,以改进和提升当今的史学工作。

参考文献:

- [1] 吴缜. 新唐书纠谬[M].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 章学诚. 《唐书纠谬》书后[M]// 仓修良,编. 文史通义新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历史与文化的歧义与超越

——家族和族谱研究中的一个思考*

陈支平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在当今的区域史研究中,有两个名词是经常被混搭并用的,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与“文化”,例如“中州历史文化”“齐鲁历史文化”“闽台历史文化”“客家历史文化”等等。学者们对于“历史文化”的混搭并用,似乎没有太多的疑虑。然而本人从近年来对于区域史的研究经验中,却越来越感觉到“历史”与“文化”这两个貌似神合的学术用语,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歧义。

众所周知,历史学的目标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客观与严谨是从事历史学所应秉持的基本立场。但是作为“文化学”,其所追求的目标,或者说它的功能,更多的是注重对于传统良善道德与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弘扬。用我们现在经常表述的话语,就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样一来,“文化学”的研究者们,就不能不有意无意地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学客观严谨的态度立场,从而出现某些服从大局性的趋利性倾向。于是,貌似神合的“历史文化”,它们之间所存在的歧义是在所难免的。

我提出这样的意见,似乎有危言耸听之嫌。然而在“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这种歧义,却是客观存在的。下面,我即以我稍为擅长的闽台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家族和族谱问题,思考如何在今后的历史学研究中给予“历史”与“文化”二者各自较为恰当的学术定位。

一

研究闽台区域史的学者都知道,家族组织、乡族组织是闽台区域社会的重要基础。慎终追远式的家族、乡族史研究,不仅是专业学者们必做的课题,而且也成为闽台两地民间社会所共同关注的

历史文化话题。

至少从五代、宋以来,福建以及后来的台湾,民间普遍形成了关于闽台家族来源于河南中州的历史记忆。印证这种血缘与文化渊源关系的资料,除了来自闽台民间世代相传的口传资料之外,更多的是体现在闽台区域民间修撰的族谱、家乘之中。从流传至今的闽台两地民间族谱中所记载的各个姓氏的族源追溯上看,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家族,声称自己的家族来源于中州河南的世家望族。

民间口传资料和私家族谱的文献记载,往往具有从众性和标榜性的特征,需要一个鉴别取舍的过程。福建民间的口传资料和私家族谱文献记载与历史的真实性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近30年来,随着福建民间口传资料和私家族谱文献记载中关于“闽台居民来源于河南中州”观点的不断被放大,许多严谨的历史学家,也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认真的考证分析。基本的论点是,现在居住于福建与台湾的汉族居民,其先祖族源的源流是十分复杂的,既有自秦汉以来北方汉民的迁入,也有由原来的土著闽越族后裔转化而来,宋元之后,还有少量海外移民的后裔加入其间。即使是自秦汉以来从中国北方迁移入闽的汉民,也不仅仅是来自中州河南,而是东起辽东渤海、吴中延陵,西至武威敦煌,均有各个姓氏的后裔子孙迁入闽中各地。真正来源于河南中州的北方汉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至于现在有人把历史上河南中州向福建的移民划分为三个高潮期,更是张冠李戴,与史实不符。

宋代以来关于“闽祖光州固始”的传说之所以盛行于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五代时光州固始王审知兄弟的率部入闽,不仅带来了众多的固始乡

*收稿日期:2013-11-22

作者简介:陈支平(1952-),男,福建惠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

引用格式:陈支平. 历史与文化的歧义与超越——家族和族谱研究中的一个思考[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004-006.

亲一道迁移闽中,并且在闽中建立了第一个地方政权——闽国。固始王审之兄弟的率部入闽,可以说对于福建这个原属于边陲的落后区域的开发进程起到了里程碑式的重大作用,对宋代福建区域的人文格局及其民间社会,产生了直接而且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从广州固始迁移而来的王氏家族及其部属,随着闽国的建立,也都成为闽中的统治阶层,为社会所仰慕。于是,在这两种因素的潜移默化之下,闽中的不同来源、不同姓氏的居民,就不能不逐渐受到光州固始这一祖源符号的影响,而这种祖源符号就普遍存在于闽台区域的民间族谱中。

不仅汉民家族的族谱修撰如此附会合流,即使早先属于闽中土著的一些族群的后裔,也在宋代这一风气中变更其初,把越人变成十足的汉民姓氏。现在生活在东南地区的畬族、回族的族谱,虽然其中或多或少保存了他们自己族源追溯的某些特征,但是从始祖的塑造上,则是毫无例外变成了与汉族相关联的共同的祖先。由此可见,至少从宋代以来,福建地区乃至整个南中国,在民间家族的溯源过程中,其历史的真实性与民间口传资料和私家族谱文献记载之间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的。我们在研究福建地区乃至整个南中国的家族发展史的时候,假如过于执着于历史文献的记述和所谓的“历史的集体记忆”的真实性,恐怕都将不知不觉地被引入到比较偏颇的学术困境。

二

文化的认知与历史的真实性其实是无法等同起来的。闽台区域民间对于族源的追溯由此所产生的世代口传资料与族谱文献的文字记述与历史的真实性存在差异,这并不能影响我们对于文化认知的分析以及这种认知的文化意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超越于历史真实性的文化认知,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也许更加具有历史与文化的永恒价值。

从我们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即使闽台区域汉民先祖的相当部分不是来源于中州河南区域,但是其巨大部分来源于中国的北方地区,确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的历史过程,势必给居住在闽台区域的汉民后裔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

上古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是所谓的“百越纹身地”,十足的边缘区域或者说是边陲区域。北方

汉民族的南迁,一方面给东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也在这一代代的汉民后裔的文化意识中,积累了向往北方汉民族核心的牢固心态。再加上长期以来北方南迁汉民在东南地区的繁衍生息,兴衰存亡的艰难延续,促使这里的汉民形成了攀附中原世家望族的社会风气。于是,向往中原核心的文化边缘心态便在东南地区的民族意识中世代相传,牢不可破。这种边缘文化心态反映在福建地区以及后来延伸的台湾地区,同样也是十分显著的。从闽台区域文化传承史的角度来考察,无论是乡族社会的建构,道德价值观的承继,还是国家核心主导地位认同等等的诸多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显露出中原核心与福建边陲的矛盾复杂的向往心态。这种文化心态必然会集中凝聚体现在某一个象征性的文化表象之上,那么最具典型意义的王审知从中州河南固始入闽的历史故事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福建人乃至后来台湾汉民的集体文化记忆。

宋以来,中国南方的士子们在继承和补强中国正统的伦理文化规范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理学家群体对于中国后世的文化贡献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我们在阅读早期南方士子们求道为学的著述时,不难从中看出他们津津乐道于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源于中州的“正统文化者”的心态。而这种“正统文化者”的表述中,已经使自己不知不觉地演化成为一名亦步亦趋的北方文化中心标识特别是中州标识的追随者。正是宋代福建的主流知识分子们坚持不懈地从中州那里传承了文化思想意识形态进入福建,并且又进一步努力把这种源于中州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融入福建及中国南方的社会之中。这样一来,源于中州核心区域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就与处于边陲区域的福建各地的社会生活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文化核心与边陲观念的长期熏陶下,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每一步发展,无不冠上追溯中州河南的辉煌帽子。这种历史文化的惯性,直至今日依然如此。

历史学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性,而文化则更多的是体现在人们的心理认同的层面,显然这二者是无法等同起来的。由此再来看看中州文化与闽台文化的关联性,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从宋代以迄近现代闽台民间家族溯源史的演变历程看,后代的福建以及台湾的民间社会,更关注的是

民间口传资料及私家族谱等文本的显示表象,而对于其先祖的真实历史,倒是比较的无关紧要。我们今天探讨闽台家族与中原固始的渊源关系,探讨中州文化与闽台文化的传承关系,假如非要一意孤行地寻找什么纯正的“中原血统”及其源流细脉的“真实历史”,我想是既无必要而又永远不可得到,其结果必然是恰得其反而又纠缠不清。我们只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一道认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包容性,才能从无限广阔的空间来继承和弘扬我们祖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正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特征,造就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延续,造就了中华民族

文化一直得以传承和发展的辉煌历史。

历史学是属于学术的,学术价值的核心是严谨与创新。而文化更多的是体现社会价值的,人们不管其愿意与否,社会价值又将是超越学术与科学等等各个层面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在从事历史学研究时,“历史”与“文化”的混搭并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习惯性的。“文化”由“历史”所产生演化,因而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假如我们硬要把区域历史学的研究演变成为宣传弘扬文化的一个万能注解,那就十分的不合适了。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说计量研究*

范金民

(南京大学 历史系,南京 210008)

从事明清史研究,随时随地会接触数据,计量研究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如何进行计量研究呢,笔者以为有几点值得讲究与重视。

一、能量化者尽量量化

笔者曾研究明代江南丝织业,发现明代后期除了赋税钱粮有加派,随着统治者生活的日益奢糜,朝廷对丝绸需要量也有加派,对丝绸生产重地江南各地不断加大派织数量。有关历次加派量,《明实录》多有记载,应该较为系统,于是笔者系统地摘录《明实录》中的相关数据,结合文集和《明史·食货志》等记载,对整整有明一代丝绸的加派量作了较为系统的统计,以量化的形式说明了朝廷丝绸加派的程度,再考证当时江南官营织造的实际生产能力,纠正了《明史·食货志》中的夸张性说法。再如清代在江南江宁、苏州和杭州设立三织造,几乎与清朝历史相始终,但对于三织造的生产规模和织造数量,既有研究往往避而不谈,未能作出起码的说明。笔者系统检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钱粮奏销档、三织造档,以及户科题本

等,摘录三织造每个织局的历年生产量、解运量和钱粮报销量,对清代前期三织造生产稳定时期的生产能力和实际生产量,分织局作了数量统计,具体地阐明了三个织造局的生产规模和织造产品。再如清代乾隆二十五年(1760)统一天山南北后,直到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占领南京,朝廷每年通过江南三织造办解一批丝绸,运到新疆天山南北伊犁、喀什噶尔等六个地区,用于交换各地盛产的马匹羊只及毛皮等,称为“贸易绸缎”。但这种贸易绸缎的数量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它究竟以多大的规模展开,有关文献记载既混乱,又不确切,学界仅凭零星记载,作出的估计往往极为悬殊,个别研究仅凭若干数据,便过度发挥,认为其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以证明内地与边疆的关系日益紧密。其实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相关档案中有着完备的记录,前后95年,无一或缺。笔者查阅档案,摘录每年定织丝绸总量、三织造之间的分派量、价格报销量、六个贸易点的分配量,以及这种绸缎的色彩等,分别制成《贸易绸缎数量及其地区分配表》《贸易绸缎品种比例表》《贸易绸缎色彩表》和《江南三织造贸易及其销银数量表》,对贸易

*收稿日期:2013-11-26

作者简介:范金民(1955-),男,江苏无锡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清史。

引用格式:范金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说计量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006-008.

绸缎的总量、各个织造局的承担量、报销银数以及六个贸易点的具体分配量,确切地作出了数量上的分年统计,将各种估计改定落实为数量上的精确统计,全面地反映了贸易绸缎的基本面貌。

二、无现成数量的,争取转换而成量化

有些问题,并无现成的数量记载可资利用,似乎令人无从着手,但如果通过转换,也许也能作出数量上的估计或统计。如著名的中国文化地理专家陈正祥先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联合国农业委员会、粮食和农业组织以及国际地理学会的土地利用委员会等组织的委员,均曾要求其提供中国蝗虫灾害分布的地图。他突然想起八蜡庙,凡有八蜡庙的地方,一定是受了蝗虫灾害的地方,假如绘制出八蜡庙的分布图,那么蝗虫灾害图也就出来了。于是他专门从各地方志中寻找八蜡庙、虫王庙和刘猛将庙的记录,将其注录在地图上。经过八个月功夫,制成一幅《中国蝗神庙的分布图》,清晰地标明了中国蝗灾的地区分布。这实际上是利用资料,将单个记录转换成系统数据的一个成功事例。再如笔者研究明清江南进士,原无现成数据可资说明,但历科殿试后,留下进士题名碑录之类一手材料,可以对各科的进士按地区要求作出数量统计。于是笔者利用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辑录江南八府每科中第进士数量,绘成《明清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图》,制成《明清江南各府进士比例表》《明代江南进士分县统计表》和《清代江南进士分县统计表》,既对江南进士作了数量上的总计,图绘了明清两代江南进士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又对江南各府和各县的进士数量作了地域范围内的具体统计,为分析江南进士的地位、作用以及与其它地区的比较奠定了坚实的数量基础。

三、既作数量统计,也需注意相应问题,有所讲求者

一是用以统计的数据要尽可能齐备。毫无疑问,数据越齐备,所作统计越精确,越可靠,也越有说明力。如清代江南三织造的丝绸产量和“贸易绸缎”量,如果仅仅依据其中的几年数据,就不足以反映全貌,没有充分的说明力。前人仅仅依据少量数据,就得出诸多结论,其结论就难以凭信。

二是所用数据要可靠,或需经过精心考订,不能随意选择材料,甚至视相左的材料而不见。如探讨清代江南棉布加工业踹坊的数量,有专家为了论证苏州应雇踹匠人数之多,依据许涤新与吴承明先生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洪焕椿先生的说法,认为“仅康雍乾时期苏州的踹坊就达六七百家之多”。其后辗转相引,蹈袭此说。其实关于清代苏州踹坊及其雇工数量,雍正八年(1730),浙江总督李卫曾奏报:“从前各坊不过七八千人,现在细查苏州阊门外一带,充包头者共有340余人,设立踹坊450余处,每坊容匠数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10900余块,人数称是”。由此奏折和参考其他碑刻、文集、方志、笔记等相关记载,可以确知当时苏州包头有340余人,开设踹布作坊450余处,所谓“六七百家踹坊”之说,至今未见任何史料依据。

三是对史料不能任意想像与发挥,作过度解读。如有专家为了论证江南不产铁而用铁量浩大,以论述江南商品流通量之规模,引用周之龙《漕河一览》卷十一《海船铁锚》“有重千钧者”这则材料时,未作鉴别,并且以此为依据,轻率地下结论说:“按每钧30斤计,则一锚重约30000斤。如海船用五、六锚,则制作这些锚需铁15—18万斤之多……清代中期年造海船100艘,需锚铁1500—1800万斤(7500—9000吨)”。其实清代一艘海船的载运量,大约在15万斤至30万斤之间,铁锚重量等于或接近载重量,决无可能,而且一艘海船根本无需用五六只铁锚。实际上,有史料记载:“大铁锚轻重,视船之大小,又有二锚、三锚之分,由此渐杀,制皆仿此”,其重量为:“大锚重1400斤,二锚重1200斤,三锚重700斤”。也就是说,一艘海船用锚三只,全部重量至多仅为3300斤,与论者所估算的15—18万斤出入真不可以道理计。

四是量化研究需要符合常识。如时下盛行的明清农田复种指数的论述,美国学者彭慕兰先生主张有到200%者。此为凿空之论。盖因明清江南种植稻麦一年二熟,而要移栽水稻,就要留出至少1/10的田地休闲以作秧田,所以即使复种指数最高,也不会超过190%,200%只是有违农事常识的纸上泛论。

五是若作数量比较,必须要合理比较,或有可比性。如有专家仅仅依据织机的数量记载,就说清代吴江盛泽一镇的丝织业比苏州城还要发达,

因为晚清时盛泽镇的织机多于苏州城。其实盛泽镇的织机,都是简单的小型织机,所织多是平绸,只要织匠一人即可操作,而苏州城的织机是花楼机,织造高档缎匹,每台织机需要织工二至三人方可操作,仅从织机的构造就可知道,苏州城的丝绸织造水平远在盛泽镇之上,而断不会得出相反结论。也就是说,不能仅凭织机的数量,就来比较两地丝绸技术水平的高低。再如有人研究鸦片战争后清代苏州丝织业账房的发展,依据民国二年

(1913)实业司的调查统计材料,计算出战前战后各开设了多少家账房后进而认为,“战后67年与战前138年相比,‘账房’数量由11家增为57家,增长4.2倍”。事实上,调查材料只是反映,调查时尚有账房57家,其中开设于鸦片战争前的为11家,而不是说,战前总共开设了11家,不能将11家与46家来作简单类比。至于鸦片战争前真正开设了多少家账房,是难以知道的。这是研究者作了不恰当的比较,自然难以取信。

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

常建华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近些年来,海内外的社会史研究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寻求着某种突破。有如下研究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一、社会史与全球史

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对全球化历史溯源,我们看到15世纪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球上东西方以及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逐步打破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世界渐渐连成一个整体。

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思考。德国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提出,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念由此改变了。民族维度并没有消失,跨民族的维度在我们的经历与期望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与行为空间中的分量加重了。他认为:首先我们在社会史研究中也应该加深对空间的思考,将界限作为研究专题,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划界当作史实问题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预定为史实。其次,比较研究,即系统地寻找相同与相异之处,是历史学者超越民族史的最佳途径。第

三,关于“西方与其他”的专题。于尔根·科卡强调对全球史研究的开放,能够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它能迫使社会史学者,用对外部因素、广泛的交织、跨民族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关注,来补充他们在社会内部动力范畴内作出的习惯解释。^[1]

美国学者彭慕兰探讨全球史(世界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他提出可以把社会史分成日常生活史(劳动、饮食、育儿、恋爱、退职、残疾等)、大规模社会组织史(如国家社会关系、阶级构成、种族关系)、社会运动史(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历史)三个部分,“世界史应当从具有浓厚社会史成分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计划中、从宏大的社会史思维中吸收很多东西。”^{[2]268}综合社会史研究成果建立与世界史的联系,对于彭慕兰提出的理论至关重要。

就中国史而言,明代社会的重大变迁出现在16世纪也不是偶然的,恰恰与中外贸易开展,中国大量商品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息息相关。明朝不断尝试赋役征收折银,从宪宗成化时代开始^[3]到神宗万历实行一条鞭法制度化,明朝赋役征收折银化的过程与风俗变化的阶段符合。资料与研究表明,成化时期是明朝社会风尚趋变的时期,中经正德嘉靖之际的变化提速,至万历

*收稿日期:2013-12-04

作者简介:常建华(1957-),男,河北张家口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明清史。

引用格式:常建华.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008-010.

时期风尚奢华蔚为大观。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影响重大,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使得新的经济成分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性行为显著。^[4]明代社会风俗的明显变化与日常生活中白银的流通和使用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所造成的。然而白银在明清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程度与作用究竟怎样,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赵世瑜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新的设想。他认为: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5]

由上可见,我们在继承传统学术遗产的同时,结合“全球化”的概念,强化世界史意识,对于明清社会变迁应当有更深入的研究。

二、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路径

台湾学术界有效开展了对于日常生活史与物质文化的探讨。台湾学者“重视生活情景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6]5,《导言》}。中研院“明清的社会与生活”主题计划所举办的“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分组题目可见研究趣味,即包括:明清士大夫的工作与娱乐安排,日常生活的档案:类书大全、细小的问题,文字与事物,城市空间、国家、城市生活的旋律。吴智和教授带领的明史研究小组探讨明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民间生活也是台湾生活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

台湾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代表作是胡晓真、王鸿泰编的《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本书以生活为主题,包含“天子至庶民”“生活与规范”“生活与

知识”“生活与文化”四个子题,代表四个不同层次或面向的生活史探索。消费生活取得的进展引人注目,巫仁恕教授《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提出晚明时期已经形成“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奠基在都市化的基础上的,巫仁恕最新著作《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以明代中叶至清中叶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活动作为研究核心,尝试将“空间”的观念带入到消费研究的领域,并且由城市空间出发,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了空间结构,进而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纠结。

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二者有一定的共生性,基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其突破点概括起来就是从生活史推究背后的形成逻辑,并思考它的社会文化意义。例如王鸿泰先生谈到物质文化消费与大众文化特别是生活关系的研究方法:“从细节上去看,具体地观察各种不同的“物”,到底在什么范围内流传?经历了什么样的流通过程?如何进入个人生活领域?对个人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再考察有哪些人?什么样的人?参与这个物的世界?同时,推论人与物的互动,可能构成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与人际网络?”^{[7]352}日常生活史研究需要认识“物”,借鉴多学科知识与方法非常有必要。

中国大陆最近值得注意的著作有宋立中《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宋书所论明清江南居民节日、鲜花、时尚消费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影响意义,以及游船、旅馆、娱乐服务业的经营形态,给人印象深刻;周书出自文学研究者之手,论述的对象主要指从事虚文的“词章家”一类,或者说在经济上,不靠制度保障而以文作为谋生工具、自求生路的人,揭示出诗文如何谋生以及文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体现的诸色人等是活生生的,借助物质消费才可以进入日常的生活状态,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探讨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历史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史不可分离。历史人

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日常生活史是历史人类学的重要出发点,历史人类学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欧美学术界诸多重要流派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02年德国学者汉斯·梅迪克撰写的《历史人类学》词条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独特形象而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与体验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认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在理解‘历史人类学’时,人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历史的物质性。”^[8]¹³²⁻¹³³这是具有浓烈新文化史色彩的论述。

历史人类学也与地域社会史有不解之缘。明清社会史立足于地域与田野实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经处理到日常生活、地域社会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陈春声谈到“走向历史现场”问题时,结合自己在韩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区的研究实践,阐明历史人类学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现场中“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要把握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9]

历史人类学研究需要借助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郑振满指出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10]³⁵⁸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

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

可见,历史人类学重视地域、从生活出发的研究取向,是社会史研究十分需要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是社会空间的扩展,强调研究中把握好社会与村落、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化的关系;其次重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将感觉、日常生活、社会与文化的建构等等纳入视野;最后强调跨学科的视野,这些年历史人类学、艺术社会史、医疗社会史、法制社会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社会史展示出美好的学术前途。

参考文献:

- [1] 于尔根·科卡.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史研究[J]. 景德祥,译. 史学理论研究,2007,(1):58-65.
- [2] 彭慕兰. 社会史与世界史:从日常生活到变化模式[M]//杰里·H,主编. 全球史读本. 夏继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3] 张瑞威. 一条鞭法的开端:论明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J]. (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 明史研究,2007,(10).
- [4] 万明. 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M]//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5] 赵世瑜. 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63-74.
- [6] 蒲慕州. 生活与文化[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 [7] 王鸿泰. 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台湾二十年来新史学的发展[M]//江南社会历史评论(4).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8] 斯特凡·约尔丹. 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9] 徐桂兰.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27-32.
- [10] 刘平,等. 区域研究·地方文献·学术路径——“地方文献与历史人类学研究论坛”纪要[M]//中国社会历史评论(10).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文献与宋史研究的特点*

李华瑞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一、以传世文献为主的宋史研究

从数量上看,汉唐资料太少,明清资料太多,宋代传世文献处在较为适中的范围。刘琳等《现存宋人著述综录》(巴蜀书社 1995 年版)著录经部 416 种,史部 889 种,子部 2180,集部 1370 种,丛书 92 种,总计 4855 种。实际上作为可利用的史料剔除重复大致只有 1000 多种。有学者估计穷一生之力可以阅读一遍。

邓广铭先生说四库全书最有利于宋史研究。四库全书主要收录清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备。汉唐典籍因多种原因到清初时流传有限,大大影响了四库的收录,明代文献因清人有偏见收录不多,如明人文集流传比宋多数倍或十数倍,而实际收录就没有宋人的多,而清代只收录至乾隆以前。

四库收录宋代文献约占现存宋代主要文献的六七成。现存宋人文集约 800 余种,四库收 400 余种;笔记小说今存五六百种,四库收近 400 种;基本史料《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献通考》《玉海》《三朝北盟会编》、重要方志、野史、别史以及子部所收宋代类书更是遗漏不多。重要的文献只差《宋会要》。

再从史书编纂上看,宋代在编纂当代史的历史著作方面,是历代最好和较为完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分册》的编纂者说“新史体先后创设,长篇巨著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各种地理志的纂修,以及把史学领域扩大至金石学等,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特别是出现于前代的《实录》《日历》《国史》编纂制度在宋代制度化和系统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宋史研究在各个断代史中不仅落后于国内各断代史研究,也大大落后于国际宋史学界,几乎没有中国大陆学者的声音。

但在改革开放以后 30 多年迅速赶了上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宋史学界在经济史、典章制度史、财政问题与部门经济史、城市史、人口史、货币史、区域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家族史、妇女婚姻、文化思想等都有颇见功力的专著问世,这些专著既代表着宋史研究的真实水平,也记录着宋史研究者们在不同时期走过的心路历程。而且重复选题较少,这在各断代史中较为突出。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宋代史料较适中,易于做专题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关于考古新材料,总的来说,宋代考古新材料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出现如先秦、秦汉、魏晋隋唐、西夏那样引起史学研究变革的新材料,如甲骨文、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也没有有待开发整理的明清档案那样一类资料。二是已有的考古新材料尚不足以推翻传世文献的记载。宿白《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对宋代城市遗迹、五代两宋墓葬、农业手工业遗迹、宗教遗迹等五个方面有较为详细的论说。

二、缺少新材料对宋史研究的不利影响

众所周知,引领时代学术新发展主要有两个要素,即新材料和新问题。20 世纪初以来,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带动了先秦史的研究;因为简牍的发现,带动了秦汉史的研究;因为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带动了北朝、隋唐的研究;因为黑水城文献的出土带动了西夏史研究的新生;因为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带动了明清史学的研究。而宋代没有这样的类似的新材料,因而在传世文献成为中西学者都可以径直摄取背景下,中国学者的宋史研究在方向、路径乃至议题的选择方面,许多是受海外学界的影响,在国际汉学界宋史研究交流的平台,中国学者能够主导潮流,影响研究取

*收稿日期:2013-11-25

作者简介:李华瑞(1958-),男,四川绵竹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辽宋夏金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

引用格式:李华瑞.文献与宋史研究的特点[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011-012.

向的方面还相当有限。中国学者的方法、思维、价值取向乃至议题的选择都是跟在西方(包括日本)学者的后面亦步亦趋。换言之,宋代的历史是中国的,但对于宋代历史许多大问题的解释却是由西方的思维模式和方法来决定的。除了对宋代文献资料的考订、基本史实和基本制度的叙述属于中国学者自己所为而外,从80年代以来国内宋史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如唐宋变革论、士人家族、士大夫政治、士人身份转型、科举与社会流动、性别史、基层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乃至宋代的历史地位和走向等无不都是由海外学者先吾着鞭,即所谓的“慢半拍”。这种状况与汉唐史研究有很大不同,西方学者利用的新材料主要依靠中国学者的解读和研究,虽然在方法、理论的许多方面西方学者仍然主导话语权,但在新材料的公布、解读上则是中国学者主导话语权,因而也就能够主导许多由新材料引出的新问题的话语权。

由于上述原因,长期以来国内宋史学界主要围绕传世文献进行研究,即使有新材料发现,也缺少应有的敏感度,而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如新“发现”的《宋人佚简》、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等宋代文献文书,虽然有少数宋史学者因各自所需而阅读检索,但是系统整理和研究的却不是宋史学者,而是唐史学者。而且组织相关议题的学术讨论也多是唐史学界出面举办。只有新近墓葬出土的《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才由宋史学者进行整理和初步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宋史学者在新材料面前整体反应上略显滞后。

三、把握新旧材料的尺度

第一,对史料的收集和占有,不能分有用和无用,其实对目前稀少的新材料之所以不敏感和冷漠,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新材料能为己所用就关注,否则如同陌路,这是碎片式研究的一种表现,而没有把稀少的新材料作为宋代整体历史、整体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待。其实,对新发现的宋代材料进行整理和研究本身应是宋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属于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且从宋史研究者的角度整理

和研究宋代新材料,其问题意识和对材料的解读,与不专门做宋史研究的学者相比更有优势,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新材料的文献整理层面上。

第二,固然新材料主要是指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和新发现文献文书,但是用新方法、新视角在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这种被重新发现的旧材料也是一种新材料。譬如陈寅恪用最一般的正史材料论述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特点,就是显例。因而开阔眼界,另辟新径,从最常见、最一般、最大量的文献资料中,发现和挖掘“新材料”,对研究宋史来说就显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重视考古出土文物资料、出土文献、图像资料的价值,对于提高宋史研究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所有新材料不可盲从和迷信。新出土或新“发现”的文献、文书本身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许多可称为“国宝”,无可置疑,但是文物价值高不等于史料价值高。新材料的史料价值只有在与传世文献“旧材料”的比对中显现出来,在比对中发现新材料能够对已知文献的不足和细节做补充、矫正、纠误甚或取代,从而产生新的议题,并由此推进学术的新发展。必须指出不是所有新材料都有这种补充、矫正、纠误甚或取代的意义。这就要求使用新材料的人首先要熟悉“旧材料”和一些基本史实,否则盲目求新就会出现:或重复旧材料已知的常识,还以为是新发现,做无用功;或对新材料没有鉴别,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仅无助于新问题的产生,而且十分有害于学术的推进。由此观察明清时期家谱、文书的史料价值,也可作如是观。

第四,对于缺少新材料,以传世文献为主的宋史研究来说,运用新方法、新理论、新视野,尤显得重要。自20世纪初以来,新方法、新理论主要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和历史理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问题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人为因素,使新方法、新理论意识形态化或者“惟一”化,致使研究走了很多弯路。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破除“惟一”神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取得进步的重要表现。今后从域外学习新的方法和理论仍然是开启新视野的重要途径。但如何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理论中,摸索适合本土宋史研究的理论和模式已为越来越多的宋史研究者所关注。

家谱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以明清徽州家谱为例*

徐 彬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一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对于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20世纪,因徽州文书的发现,傅衣凌、张海鹏等人开始了对徽州商人的研究,因而推动了徽州社会研究。明清徽州社会的典型性成为解剖封建社会后期发展的样本,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州民间秩序等研究领域的拓展,逐步促进了徽学的形成。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徽学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区域文化研究的学问。

近年来,如何开辟新领域、寻找新路径、发掘新史料,成为徽学研究的新课题。整理研究徽州家谱是新一轮徽学研究的重要基石。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编修了大量的家谱,这些家谱被较好地保存了下来,现存2000余部。明清徽州家谱为徽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典型的研究资料。徽州家谱反映了宋元以来徽州家庭结构、人口繁衍和迁徙、宗族关系,以及宗族与基层社会的关系,通过对家谱的研究可以形成对徽州基层社会更全面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中国明清社会作更深入的考察。这一点是其它资料及其它研究途径无法替代的,因此徽州家谱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会成为推动徽学研究深入发展的支撑。

二

明清徽州家谱不仅记录了徽州社会的实态,还有机地融入到徽州社会之中,通过发挥家谱的功能,担当起基层社会秩序重构重任,这是徽州家谱撰修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徽州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这表明徽州是一个高度宗族化、组织化的地方社会,这种组织化的形成是在社会变迁中不断重构而生的。徽州基层社会秩序的形成,家谱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千丁之族”是由谱系维持的,“千年之冢”是由家谱中的墓图固化的,这说明家谱承担着基层社会秩序重构的重任。通过徽州家谱,可以对徽州社会以下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 徽州人口流动与分布。宋元以降,徽州人口一直保持着高流动性,有北方人口的迁入,有徽州人口的区域内流动,还有徽州人口的外迁。这种流动始终有序、理性地进行,究其原因,与家谱在其中起着规范、约束和引导作用具有相关性。

2. 徽州宗族秩序的构建。宗族化是徽州基层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宗族化也标志着人群的组织化。家谱是宗族组织化的基础,家谱通过谱系的构建,构筑了宗族的历史,同时也实现了宗族在时间维度上的有序化,保证了宗族内部人群尊卑有序;家谱利用统宗谱、支谱等形式,实现了宗族不同分支之间的联系与区分,在考虑血缘关系的前提下,更侧重从空间维度构建了宗族间的秩序。由众多有序的宗族,进而构筑了基层社会的秩序。

3. 徽州社会分层。社会运行通畅程度与社会分层的合理与认同相关,家谱通过确立“亲亲”、“尊尊”的编写原则与方法,实现了宗族内部的分层;士绅集团利用家谱实现了对乡村绅权的构建,他们一方面利用家谱实现对族内低阶层族众的控制,同时也利用家谱区分不同宗族在社会中的层次,从而保证了士绅集团内部的有序化,也维持了基层社会内不同阶层的秩序。

*收稿日期:2013-12-11

作者简介:徐彬(1971-),男,安徽广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史学史和徽学。

引用格式:徐彬.家谱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以明清徽州家谱为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013-014.

4. 徽州基层社会经济特征。经济的稳定是基层社会秩序建立的保障,徽州家谱利用有关族产规定,利用对祠田、墓产的保护,形成宗族的共同经济基础,保证了宗族内部的经济互助。家谱中关于宗族经济的记载,同时也是不同宗族间地区区分的依据,是不同宗族、不同村落避免纷争的依据。家谱中关于族产的记载,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起重要的稳定作用,是基层社会经济秩序重构的基本依据之一。

5. 徽州基层社会教化。良好的社会教化是基层社会秩序构建的重要内容。徽州家谱始终保持着教化功能,对基层社会秩序形成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徽州家谱以朱子家礼为指导思想,保证了教化的权威性与长期性,即使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家谱依然起到教化功能。家谱的“隐恶扬善”功能,对符合儒家伦理规范行为大加宣扬,通过人物传记的形式,实现了对家族成员的引导,保证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家族成员依然保持正确的行为。家谱中的家法族规,则从强制角度加大了对宗族成员的约束,保证了社会教化的长期有效性。

6. 徽州商人社会。徽州社会另一重要特征是徽商在人口比重中占大多数,成为名符其实的商人社会,这是传统社会的重要变化。徽州家谱通过宣扬商业理论,提高了徽州人经商的信心;徽州家谱通过为商人立传,也满足了徽商名垂青史的需求;家谱作为一种重要的联谊工具,为徽商商业行为提供了良好的人际环境,这些都显示出徽州家谱对徽商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推动了徽州商人社会的形成。

三

徽州家谱是认识徽州社会的基础史料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具体使用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其作为“家史”的“求真”与“溢真”特性。

章学诚指出“谱为一家之史”,即明确了家谱具备史学的性质,这一认识在明清徽州家谱编写中得到认同。因是“一家之史”,家谱便以“求真”为其出发点。在徽州家谱中主要体现为:一是徽州家谱中特别重视“谱辨”的撰写。明代徽州学者程敏政在《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中精心作了11篇谱辨,详细辨析了徽州程氏世系源流。这一做法也引发了后世程氏家族对家谱的考证工作,在清代出现了《新安程氏统宗列派迁徙注脚纂》和《新

安程氏统宗补正图纂》,对程敏政的考辨工作进行了反思。这类工作在其它家谱中也较普遍,保证了家谱的真实性。二是徽州家谱多以始迁祖为家谱的可知祖先,避免了盲目的冒祖认宗。明代徽州学者汪道昆说:“由迁祖而溯之,世泽之斩久矣,久则不可为典,于是乎祧之,恩不读亲,义不凌节,礼之善经也”(《太函集》卷22《太玄吴氏宗谱序》),说明坚持以始迁祖为家谱始祖的合“礼”性。清代徽人章大泽则指出这一行为在徽州的普遍性,他说“吾郡诸望族恒以始居是邦者为太祖,由太祖而上远系难信者不悉详,由太祖而下远条虽数十百世不可紊,此一本之亲切而易明者。”(《柳川绩邑胡氏宗谱·章大泽序》)三是强调支谱编修,对统宗谱编撰采取谨慎态度。如汪道昆编撰《万历灵山院汪氏十六族谱》时考虑的就是“凡十六族丘墓相系,昭穆相承,谱牒相通,庆吊相及,亲矣近矣。其余非不亲也,非不近也,或衰微,或淆乱,或拥格,或散殊,旧谱或系而不名,或名不而竟,率仍其旧,罔出入以干宗盟”(《本宗谱序》),因此他所编的族谱也被称“汪氏十六族近族谱”,完全考虑的是可知的近支谱,而不盲目进行统宗谱的编撰。以上这些做法,有效保证了徽州家谱史料的“真实”性。

但作为家谱,徽州家谱也同样有“溢真”的特性。对徽州社会有深刻认识的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指出“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所指虽是明代家谱的通病,徽州家谱当然也多少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如以《新安名族志》为例,该书记录徽州大姓93个,其中有一半均言出自河南,实际上经过考证,许多姓氏并不能确定清晰的迁徙路径,存在较多的疑问。另徽州家谱还多坚持“谱者史例也,谱为一家之史,史则善恶具载,谱则书祖宗之嘉言善行而不书恶者,为亲讳也”(《绩溪张氏宗谱·凡例》),这也掩盖了一些社会的真实要素。

因家谱“求真”与“溢真”并存,故在家谱使用中应坚持多种史料参互使用,以使家谱发挥最大史料价值。这一点王世贞说的比较辩证,他说“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然其谱宗闕表官绩不可废也。国以草创之,野以讨论之,家以润色之。”(《弇州山人四部稿》卷71《皇明名臣琬琰录小序》)此观点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指导意义。